

浪漫的与古典的 文学的纪律

梁实秋

中国现代文学
作品原本选印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原本选印

浪漫的与古典的
文学的纪律

梁 实 秋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北京

本书辑入的两部文学评论集均由新月书店出版发行。《浪漫的与古典的》于1927年8月初版；《文学的纪律》于1928年初版，1931年7月再版。此次分别据初版本和再版本重排，对其中个别错讹作了校正。两书着重于评介西方文艺思想，同时也阐明了作者的文艺观点。材料丰富，分析细致。其基本观点是宣传“人性论”，当时颇有影响，也成为文学界批评的对象。它们是现代文学工作者所必备的资料之一。

浪漫的与古典的 文学的纪律

Langman De Yu Gudian De

Wenxue De Jilu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122,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6 $\frac{9}{16}$ 插页8

1988年4月北京第1版 1988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7,120

ISBN 7-02-000171-8/I·172

书号10019·4231 定价1.30元



原本封面

目 录

浪漫的与古典的

序言	3
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	5
戏剧艺术辨正	28
诗与图画	44
“与自然同化”	48
喀赖尔的文学批评观	54
亚里士多德的《诗学》	59
亚里士多德以后之希腊文学批评	82
西塞罗的文学批评	96
文学批评辨	100

文学的纪律

序言	109
文学的纪律	110
何瑞思之《诗的艺术》	128
王尔德的唯美主义	137
文艺的无政府	152

“艺术就是选择”说	156
诗人勃雷克	160
论剧	165
一 论戏剧批评	165
二 论中国新剧的前途	179
译诗一首	182
书评两种	187
《小青之分析》	187
《玛丽玛丽》	192
霍斯曼的情诗	196
汉烈的《回音集》	202

浪漫的与古典的

序 言

这是我三年来关于文章批评方面作的文章的选集。我没有用心作的文字，都不曾选在这里。这集里的九篇文章，除了《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外，都曾经发表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诗与图画》，《与自然同化》，《喀赖尔的文学批评观》，《文学批评辩》，都在北京《晨报》副镌发表过；《戏剧艺术辨正》载在留美学生季刊，后经《晨报》副镌副刊转载；《亚里士多德以后之希腊文学批评》与《西塞罗的文学批评》都在国立东南大学之《东南论衡》上发表过，后一篇又经《晨报》副镌转载。我这几篇文章，并没有什么相互的系统，就题材方面论，却不曾超出“浪漫的与古典的”范围以外，在主张上我也曾努力求其能一贯。

我借这个机会要特别表示敬意与谢忱的，是哈佛大学法国文学教授白璧德先生(Prof. Irving Babbitt)，我若不从他研究西洋文学批评，恐怕永远不会写出这样的几篇文章。我的朋友瞿菊农先生和我同在哈佛读书时，给我许多有益的鼓励与批评，我也是很感念的。龚业雅女士，我的妹妹绣玉，绣琴，和我的妻季淑，她们替我抄录一遍，我很感谢她们。最后，新月书店的余上沅先生替我把这本书印行，闻

一多先生又给我画这样一张好看的封面，我对他们也有无限的谢意。

十六年六月十七日上海

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

“现代中国文学”系指我们通常所谓的“新文学”而言。“浪漫的”系指西洋文学的“浪漫主义”而言。我这篇文章的主旨即在说明“新文学运动”的几个特点，以证明这全运动之趋向于“浪漫主义”。

这个工作有两层困难：（一）新文学现在还在很幼稚的时代，一切的文学艺术还正在试验之中，恐怕还谈不到什么确定的主义。（二）文学里究竟有没有主义可谈，在现今中国还有人怀疑。有人以为文学里的“啞死木死”是批评家凭空捏造出来硬派给文学作家的一种标帜，所以与文学的本质漠不相关，所以只要你一谈文学里的主义，立刻就有人说你是庸人自扰。但我们若悉心的研究西洋文学批评的原理，再审慎的观察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内容，就觉得这两种困难不是不可超越的。我现在不讲中国文学的浪漫主义，因为现在还在酝酿时期，在这运动里面的人自己还在莫名其妙。冷静的批评者或可考察这全运动的来踪去迹。所以我只讲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至于文学里究竟有没有主义可谈，这个问题是很幼稚，但这个问题的解答却很复杂。对于此点本文暂不详论，但我须说明我的地位。我

的批评方法是认定文学里有两个主要的类别，一是古典的，一是浪漫的。当然这种分类法不是我的独创，我只是随着西洋文学批评的正统。（这个方法可否施之于现代中国文学，留待下文细说。）据我自己研究的结果，我觉得浪漫主义的定义不但是不可能的，而且是无益的。我们心里明白什么是浪漫主义，并且在本文里我就要说明现代中国文学所含有的浪漫成分。这篇文章终了的时候，浪漫主义是什么的问题，可以不解而解了。

（一） 外 国 的 影 响

我曾说，文学并无新旧可分，只有中外可辨。旧文学即是本国特有的文学，新文学即是受外国影响后的文学。我先要说明，凡是极端的承受外国影响，即是浪漫主义的一个特征。

浪漫主义者所最企求者即“新颖”，“奇异”。但一国之文学，或全部之文化，苟历年过久，必定渐趋于陈腐。一国鼎盛的时候，人才辈出，创作发达，但盛极必衰，往往传统的精神就陷于矫揉造作，艺术的精神沦为习惯的模仿。这在希腊的亚里山大时代，罗马的黄金时代以后，以及英法十八世纪之前半，莫不如是。而浪漫主义者实难堪此。他们要求自由，活动，和新奇。国内的文学因传统的关系，层层桎梏，浪漫主义者的解脱之道，即在打破现状。打破现状的方法不外两种，一是返古，一是引入外国势力。而后一个方法在

实际上比较的尤其容易。外国文学的根本精神总是新颖的，否则便不成为外国的文学。外国影响一经传入，即如摧残拉朽，势莫能御，不管是好的影响坏的影响必将一视同仁的兼收并纳，结果是弄得漫无秩序，一团糟，但在这一团糟里面却是有生气勃勃的一股精神。这一团糟的精神不会持久的，日久气衰，仍回复于稳固的基础之上。但浪漫主义者在那一团糟的时期里面，享乐最多。他们最喜欢的就是那蓬蓬勃勃的气象，不守纪律的自由活动。所以浪漫主义者就无限制的欢迎外国影响。

福祿特尔说：“文学即如炉中的火一样，我们从邻居借火把自己的点燃，然后再转借给别人，以致为大家所共有。”这是妙譬。实际的情形并没有这样的和谐。斯达耳夫人说：“一个人生成的法国的头脑，而是德国的心肠，必致演成悲剧。”这样的悲剧，在在皆是，我们不必举别人，只看斯达耳夫人自己的祖师卢梭便是榜样。我并不一概的反对外国影响。实在讲，外国影响之来是不可抵御的，因为外国影响未入之先，必其本国文学有令人可乘之机。况且，外国影响的本身也未必尽属不善。不过，承受外国影响，须要有选择的，然后才能得到外国影响的好处。这一点是一般浪漫主义者所不暇计的。我们且进而考察现代中国文学的外国影响。

凡是文学上的重大的变动，起初必定是文字问题。例如但丁之用意大利文，巢塞之用英语，笛伯雷之拥护法文，华资渥斯之攻击诗藻，这些人在文学史上都是划分时代的

大家，他们着手处却均在文字。我们中国的新文学运动，也是如此，其初步即为白话文运动。白话行文，并不是自近年始，最浅显的例如《水浒》《西游记》等书早已采用白话；而白话文运动，绝非仅是因袭《水浒》《西游记》之前例，实乃表示一种有意识的反抗古文。这种文字上的反抗，其主因固由于古文过趋于繁难，过于人为的，但其反抗酝酿已久，何以到最近才行爆发？这爆发的导火线究竟是什么？我以为白话文运动的导火线即是外国的影响。近年倡导白话文的几个人差不多全是在外国留学的几个学生，他们与外国语言文字的接触比较的多些，深觉外国的语言与文字中间的差别不若中国言语文字那样的悬殊。同时外国也正在一个文学革新的时代，例如在美国英国有一部分的诗家联合起来，号为“影象主义者”，罗威尔女士佛莱琪儿等属之，这一派唯一的特点，即在不用陈腐文字，不表现陈腐思想。我想，这一派十年前在美国声势最盛的时候，我们中国留美的学生一定不免要受其影响。试细按影象主义者的宣言，列有六条戒条，主要的如不用典，不用陈腐的套语，几乎条条都与我们中国倡导白话文的主旨吻合。所以我想，白话文运动是由外国影响而起。随着白话文运动以俱来的便是新式标点，新式标点完全是模仿外国，也可为旁证。

白话文运动的根本原理，并无可非议。文字是文学的工具，这外国影响足使中国文学改换一个新工具，就大体看来对于中国文学是有益无害的。不过白话既经倡导之后，似乎发生一种流行的误解，以为凡是俗言俚语，皆可入文。

其实外国的文学所用的文字，也并非如此。在外国从没听说过“言文一致”的话，外国言文相差不及中国之甚罢了。但浪漫主义者的特性即是任性，他们把外国以日常语言作文的思想传到中国，只从反面的效用着眼，用以攻击古文文体，而不从正面努力，以建设文学的文字的标准。他们并且变本加厉，真真要做到“言文一致”的地步，以文学迁就语言，不以文字适应文学，这是浪漫主义者倡导白话文的结果。

讲到“语体文之欧化”则更足表明外国影响之剧烈。以白话为文，不过是在方法上借镜于外国，欧化文体则是更进一步，欲以欧式的白话代替中国式的白话。这个新颖的主张无异于声明不但中国文体不适于今日，即中国的语体亦不适于中国。至于以罗马字母代汉字的主张，则是更趋极端，意欲取消中国文字而后快，我只能看做是浪漫主义者的一出“噩梦”。

新诗的发生，在文字方面讲，是白话文运动的一部分。但新诗之所谓新者，不仅在文字方面，即形体上艺术上亦与旧诗有不同处。我又要说，诗并无新旧之分，只有中外可辨。我们所谓新诗就是外国式的诗。试取近年来的新诗以观，在体裁方面一反“绝句”“律诗”“排韵”等旧诗体裁，所谓新的体裁者亦不是“古诗”“乐府”，而是“十四行体”，“排句体”，“颂赞体”，“巢塞体”，“斯宾塞体”，“三行连锁体”，大多数采用的“自由诗体”。写法则分段分行，有一行一读，亦有两行一读。这是在新诗的体裁方面很明显的露出外国的影响。在艺术上讲则近来也日趋于洋化。某人是模仿哈尔地，

某人是得力于吉柏龄，某人是私淑太戈尔，只须按图索骥，可以百不一爽。有些新诗还嵌满了一些委娜斯阿波罗，则其为舶来品更无疑义。

西洋小说流入中国是在很早的时候，但在中国文学上发生影响则是比较的近年事。“短篇小说”的体裁在新文学运动里要算是很出色的一幕。单就体裁而论，短篇小说我们中国古已有之，有人远引《庄子》里的故事，有人近举《聊斋》，以为前例。殊不知新文学里的短篇小说，绝不是我们中国文学的正统，绝不是《聊斋》的文学习惯之继续。试就近年来报章杂志里的短篇小说而观，我们可以约略的看出哪一篇是模仿莫白桑，哪一篇是模仿柴霍甫。至于模仿施耐庵曹雪芹，则是凤毛麟角绝无仅有的了。若是有人模仿蒲留仙，必将遭时人的痛骂，斥为滥调，诋为“某生体”。盖据浪漫主义者的眼光看来，凡是模仿本国的古典则为模仿，为陈腐；凡是模仿外国作品，则为新颖，为创造。例如中国章回体长篇小说，在艺术上讲本无可非议，即在外国小说也有类似的体裁，而所谓新文学运动者必摈斥不遗余力，以为“话说”“且听下回分解”“正是”是绝对的可笑。处处都表示出浪漫主义者之一方面全部推翻中国文学的正统，一方面全部的承受外国的影响。

中国戏剧本是我们中国所特有的一种艺术。西洋的“奥普拉”，据辜汤生的定义，就是“连唱带做”。那么中国戏剧似与“奥普拉”相近。新文学运动以还，许多外国剧本都被介绍给中国来。这些剧本在中国文学上发生影响的不是莎

士比亚，不是毛里哀，更不是莎孚克里斯，而是萧伯纳，是易卜生，是阿尼尔。现今的时代是一个浪漫的时代，中国文学正在浪漫，外国文学也正在浪漫。浪漫主义者有一种“现代的嗜好”，无论什么东西凡是“现代的”就是好的。这种“现代狂”是由于“进步的观念”而生，说来话长。中国戏所受外国影响，若确切些说，只是受外国近代文学的影响。所以新文学运动给我们中国文学陡然添了一个型类，叫做“散文剧”，举凡一切艺术技术完全模仿外国。散文剧的勃兴是受外国影响的结果，这是无可讳言的。但也不是可耻的。中国文学添设这一个型类，于中国文学无损。不过近来有许多浪漫主义者似乎以为“新戏”可以代替“旧戏”，同时他们自己还不晓得所谓“新戏”就是外国戏，这就欠妥了。戏剧无新旧可分，只有中外可辨。中国的“国剧”现在连根基还没有重修起来，这是有待于将来的努力。

外国文学影响侵入中国之最显著的象征，无过于外国文学的翻译。翻译一事在新文学运动里可以算得一个主要的柱石。翻译的文学无时不呈一种浪漫的状态，翻译者对于所翻译的外国作品并不取理性的研究的态度，其选择亦不是有纪律的，有目的的，而是任性纵情，凡投其所好者则尽量翻译，结果是往往把外国第三四流的作品运到中国，视为至宝，争相模拟。我们不要忘了，新文学运动里还有一个名词，叫做“文学介绍”。这在外国文学里，我没有听说过；在我们中国文学里，我也没有听说过。考所谓“文学介绍”者，即将某某作者的传略抄录一遍，再将其作品版本开列详